

混合还是复苏:以色列语的起源

——多来源,形式和模式*

[新西兰] 诸葛漫(Ghil'ad Zuckermann)^① 著

王晓梅 译 曾晓渝 校编

提 要 本文旨在提出由于多起源的广泛存在,如果没有复苏者母语的影响,一种不再使用的语言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设想复苏的努力会导致产生一种无论从起源还是类型上都带混合特征的语言。多来源反映在重合原则(Congruence Principle)上。虽然以色列语大多数的形式是闪米特语言的,但它的模式很多是欧洲语言的。以色列语的多来源本质及其产生时重合原则的作用对历史语言学、语言计划和语言、文化及个性的研究都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混合 复苏 以色列语 希伯来语

一 研究背景

1.1 引言

“以色列语”(Zuckermann 1999)——也被称为“当代希伯来语”,现在是以色列国(建于 1948 年)的官方语言之一(官方语言还有阿拉伯语和英语),由该国 700 万公民使用。以色列语在上世纪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主要交际语言,无论是在官方领域还是私人生活中都是如此。

以色列语有特色鲜明的社会历史特征,例如从希伯来语到以色列语,缺少以它们为母语的连续链,复苏主义者所操的非闪米特语母语以及欧洲语言对希伯来文学语言产生影响。因此,以色列语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场。以色列语的多来源本质及其产生时重合原则和建立原则的作用对历史语言学、语言计划、克里奥耳语以及语法接触的研究都有启示作用。

* 本文通过意西微萨·阿错教授帮助联系得以翻译,王立新教授就文中一些犹太语相关术语的译法指正多处,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篇幅所限,此译文在忠实原文观点基础上作了适当缩减。本译文为曾晓渝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侗台语言接触类型及其变异机制研究》(06BYY055)成果之一。

① 诸葛漫(Ghil'ad Zuckermann)现在是昆士兰大学副教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剑桥大学也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曾经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 Gulbenkian 研究员。诸葛漫教授著述颇丰,其作品曾用英语、以色列语、意大利语、依地语、西班牙语、德语和俄语发表,主要作品有《语言接触与以色列希伯来语词汇扩充研究》和《以色列语——美丽的语言》等,在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译者注

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由于多起源的广泛存在,如果没有复苏者母语的影响,一种不再使用的语言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因此,复苏的努力会产生一种无论从起源还是类型上都带有混合特征的语言。

1.2 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希伯来语是犹太人民在所谓的迦南征服(公元前 13 世纪)后说的语言。它属于闪米特语言中西北分支的迦南分支。这种语言逐渐衰落直至公元 2 世纪停止使用。公元 132—135 年,朱迪亚(Judaea)爆发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巴尔-库克巴起义(Bar-Kokhba Revolt),在这次起义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死,起义的失败是口语希伯来语灭亡的标志。但是,口语希伯来语的实际灭亡时间可能还要早些。例如,基督的母语是阿拉米语(Aramaic)而不是希伯来语。在那之后的 1700 多年里,希伯来语都处于一种休眠(comatose)状态。它是礼拜和文学语言,偶尔也作为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的法通语(lingua franca)使用,但不是作为母语使用的。

给希伯来语分期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圣经》希伯来语(公元前 10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是指旧约和第一圣殿时期的碑文上的希伯来语,这可能和《密西拿》^①希伯来语(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6 世纪)的情况不同,中世纪希伯来语指的是中世纪的各种文学希伯来语(6 到 17/18 世纪),玛斯克里克(Maskilic)希伯来语(即哈斯克拉希伯来语)是文学语言,与此不同,以色列语是活的语言是作为母语存在的,它是 19 世纪末在 Eretz Yisrael 形成的。但直到 20 世纪初以色列语才作为社区语言使用,从那时算起大约有一百多年了。

下面(图 1)描绘的是我提出的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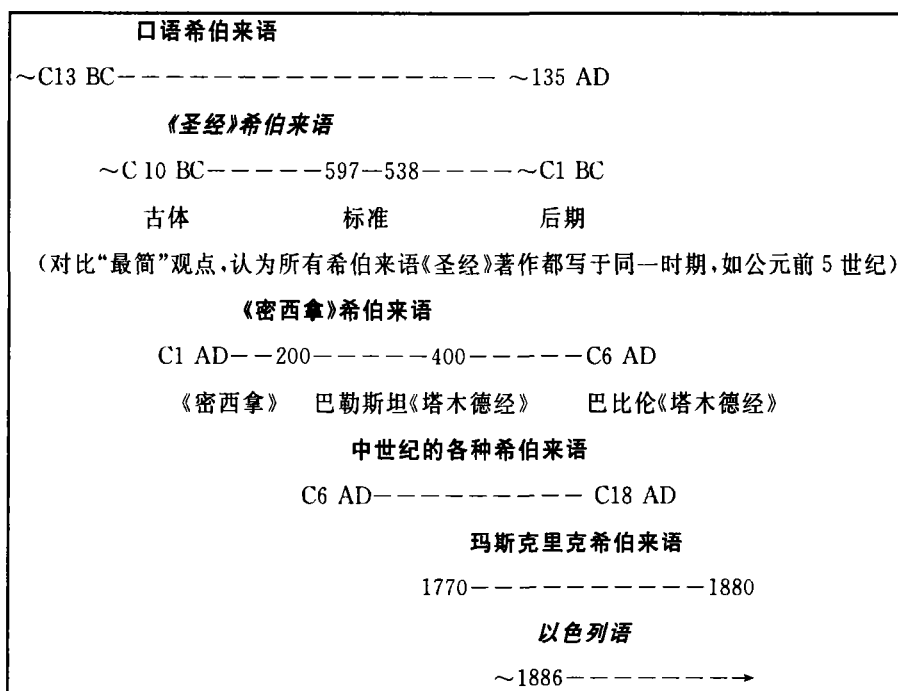


图 1 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① 犹太教律法书《塔木德经》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共 6 卷,62 篇。译者注:脚注序号照原文,后同。

1.3 以色列语的发生学分类

从 20 世纪初开始,以色列语的发生学分类就深深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现在仍然存在的传统观点,认为以色列语是属于闪米特语言的。对此予以修正的观点是把以色列语定义为印欧语的一种,即依地语(Yiddish,又译“意第绪语”)是“底层”,而希伯来语只是提供词汇和没有变化的形态的“上层”。(见 Horvath & Wexler 1997)时而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希伯来语从来没有消亡过。(Haramati,1992,2000;Chomsky,1957:218)但是,在 2—19 世纪,它不是任何人的母语。

我提出的混合论承认以色列语内部既有闪米特语又有印欧语的历史和语言的连贯性。混合的以色列语是同时建立在希伯来语和依地语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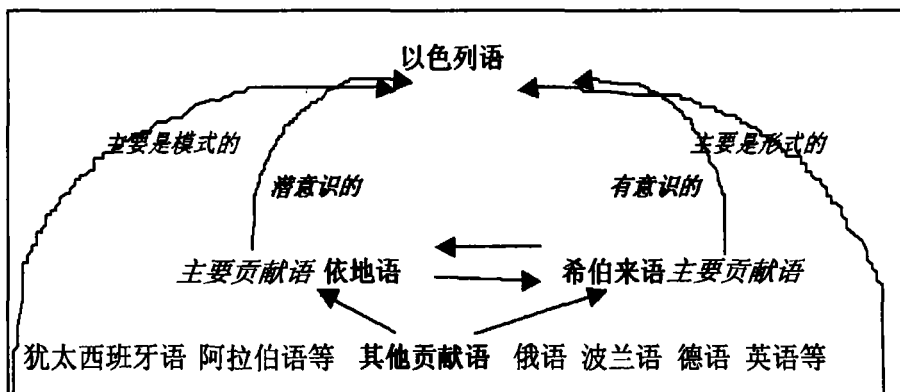


图 2 我提出的以色列语发生学的混合模式(→表示贡献或影响)

使以色列语法的“发生学”如此复杂,是由于闪米特语和印欧语的共同影响已在以色列语的主要贡献语(和第二贡献语)中发生了作用。依地语,一种有拉丁语底层的日耳曼语(其多数方言受到斯拉夫语言的影响),受到了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希腊语等印-欧语对中世纪前的希伯来语产生了影响(例如,旧约中的希腊语表达法)。而且,在以色列语出现前,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影响了各种中世纪和玛斯克里克希伯来语,(Glinert,1991)这种影响反过来又给了以色列语重要影响(与欧洲语言的贡献一致)。这增加了重合原则的重要性(§ 1.5)。

1.4 创立原则

大多数的复苏主义者是讲依地语的德系犹太人,德系犹太人是易于接受“复活的希伯来语”的群体。西班牙系犹太人(他们构成了以色列国的早期居民的大多数)和米兹腊希主义者^⑧(不包括来自也门的犹太人)中说以色列语的比例低。

Harrison 等(1988)讨论了“创立原则”在生物学和人类进化方面的作用,Mufwene(2001)把它作为克里奥耳语工具去解释为什么所谓的克里奥耳语的结构特点大多由创立人群的语言决定,即第一批殖民者。我就以色列语的情况提出了下面的创立原则:

依地语是以色列语的主要贡献语,因为它是大多数复苏主义者的母语,而且也是在以色列

^⑧ 1902 年建立了宗教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56 年与米兹腊希工人党合并成全国宗教党。

语形成初期的关键阶段在 Eretz Yisrael 的先驱的母语。

创立原则起作用是因为当后来的移民到以色列时,以色列语已牢固地确立了它语法的基础部分。因此,当 20 世纪 50 年代摩洛哥犹太人到以色列时,他们不得不学一种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语言。他们的母语对以色列语的影响比较而言是可以忽略的。这与 Wimsatt (1999a, 1999b) 的概念“生成的固有结构”有关。

同时,与反复苏的修正主义不同,我提出礼拜希伯来语同样也满足了主要贡献语的标准,原因如下:(i)尽管有上千年都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希伯来语历经数代,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文学和礼拜语言;(ii)犹太复国的复苏主义者有极为强烈的复国意识并作了巨大的努力使希伯来语复活,事实上,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

本文主要关注形态(和句法)。其他我还讨论了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对以色列语的词汇、构词、语义(Zuckermann 1999, 2003, 2004)、语音和音系(Zuckermann, 2005)、补语(Zuckermann, 2006a)和报告言语(Zuckermann, 2006b)的影响。总体来说,虽然以色列语的语音和音系大多是欧洲语言的(Zuckermann, 2005),但它的形态形式和基本词汇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闪米特语言的。图 3 说明了这种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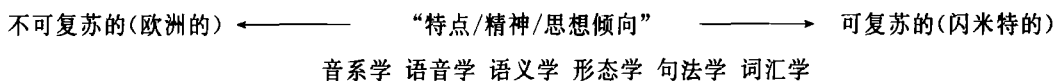


图 3 暂拟可复苏等级的连续体

例如,由于语调比一个特定的辅音更难复苏,所以音系学被认为比语音学难以复苏。在语义学中,内含义和联想含义比含义难复苏。

1.5 重合原则

我的词汇研究(如 Zuckermann, 2003)强调了重合原则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特征存在于不止一个贡献语中,它就很可能保留在新出现的语言中。

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实际上适用于语言进化的普遍规律。毕竟,任何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混合的(参照 Schuchardt, 1884 和 Hjelmslev, 1938)。这种重合是在皮钦语、克里奥耳语和其他语言的研究中普遍观察到的现象。Kerswill (2002) 有相似观点,认为几种变体共有的特征在共通语形成中是最有可能保留的。

本文认为重合原则也适合用来解释以色列语的语法特征。希伯来语的语法特征中与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一致的部分更有优势,反之亦然,而且不论这种相似是偶然的还是由于更早欧洲语言的影响。

1.6 形式还是模式

形式与模式的区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多来源。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捍卫团”的格言是“犹太人,讲希伯来语”,然而,他们在那些说“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的语言中找到的是依地语、俄语、波兰语有时还有“普通标准欧洲语言”的形式而不是模式。

显然,这并不是说如果复苏主义者关注模式,他们就可以设法中和他们母语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潜意识的。虽然他们致力于语言的纯净,他们创造的语言却恰恰映射出了他们设法消除的混合和外语的影响(以色列语既是闪米特语言的又是印欧语的)。

本文提出就以色列语这样的复活的语言而言,虽然语言的形式被仔细地研究,但它的模式却被忽视了。例如,以色列语动词模板的能产性(隐藏的)和语义经常被欧洲化,动词模板被认为完全是希伯来语系统的(与它们的语义模式相反,后者在这儿被看成是闪米特语言的形式)。总体来说,虽然以色列语的形式大多是闪米特语的,但它的模式倾向于欧洲语言。图4说明了这一观点:



图4 闪米特的形式和欧洲的模式

二 语法特征

2.1 分析性的以色列语

希伯来语是综合语,而以色列语更像分析语,无论名词还是动词都是如此。我认为文学以色列语的分析语化是受了口语以色列语的影响,后者由于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其分析语特征自始至终都要比迄今为止承认的强得多。

考虑构建状态,闪米特语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名-名结构中,第一个名词被第二个名词修饰或拥有:

(1) רפובליקת בננות

repúblika-t banánót

共和国-CONSTR 香蕉

“香蕉共和国”

与希伯来语不同,表示所有的构建状态在以色列语里不是能产的。比较希伯来语的构建状态 *'em ha-yéled* “母亲-DEF-孩子”和分析性更强的以色列语 *ha-ima shel ha-yéled* “DEF-母亲 GEN DEF-孩子”,两个的意思都是“那孩子的母亲”。

以色列语的分析性在非构建状态表示的领属关系中也非常明显。与综合性结构相比,以色列语更倾向于依地语的分析性的领属结构,如“我祖父”。因而,虽然希伯来语“我祖父”是 *sav-i* “祖父-lsgPOSS”,而以色列语是 *sába shel-i* “祖父 GEN-lsg”。

2.2 以色列语是一种“拥有关系”的语言:希伯来形式的再解释去适应欧洲模式

与 Berman (1997: 329) 和 Ullendorff (1997: 558b) 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以色列语是一种表示拥有关系的语言(拉丁语的意思是“有”,带直接宾语),这与希伯来语完全相反。以色列语是怎么说“我有这本书”的? 如果有人想说“恰当的希伯来语”(虽然带欧洲的以色列语口音),应该像下面这样说:

(2) *yésh* *l-i* *ha-séfer* *ha-zè*
 EXIS DAT-lsg DEF-book DEF-msgPROX3
 there is for me the book the this
 “我有这本书。”

名词短语 *ha-séfer ha-zè* 是句子的主语。然而,以色列语实际说的是下面这样的:

(3) <i>yésh</i>	<i>l-i</i>	<i>et</i>	<i>ha-séfer</i>	<i>ha-zè</i>
EXIS	DAT-lsg	ACC	DEF-book	DEF-msgPROX
there is	for me	ACC	the book	the this

“我有这本书。”

正如宾格标志 *et* 所示,名词短语 *ha-séfer ha-zè* 是直接宾语。这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语言规范家在给说以色列语的人规范语言,敦促他们只使用(2),矛盾的是,这种结构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的个体语言中是不合语法的。

总而言之,希伯来语中用来标志所有的存在结构在希伯来语中得到新的诠释从而适应在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

2.3 韵律结构、动词模板的能产性和辅音词根的弱地位

希伯来语传统语法有七种动词模板: $\square a \square \acute{a} \square$ 、 $ni \square \square \acute{a} \square$ (它的被动)、 $hi \square \square i \square$ (使役式)、 $hu \square \square \acute{a} \square$ (它的被动)、 $\square i \square \acute{e} \square$ 、 $\square u \square \acute{a} \square$ (它的被动)和 $hit \square a \square \acute{e} \square$ (反身性/互相性/不及物性)。(每个 \square 代表一个基本槽,表示一个空位,可以插入一个辅音)。看下面以色列语中的动词语素调整,除非标示出来,都是不定式形式:

A 用动词模板 $hi \square (\square \square) \square i \square$ (历史上是及物使役式):

- *le-hashvits* (INTR) “吹牛,炫耀”,保留了其依地语来源的辅音串 *shvits* “流汗”。
- *le-hasníf* (AMB) “‘从鼻孔吸入’,吸入(如可卡因)”,保留了其英语来源的辅音串 *sniff* (cf. *snuff*)。以色列语中原有的 *snif* “树枝、分枝”在这儿并没有起作用。

B 用动词模板 $\square a \square \acute{a} \square$:

- *la-khróp* (INTR) “熟睡,睡个好觉”,保留了其依地语来源的辅音串 *khróp* “打鼾”,参见依地语 *khrop* “snore (n)”。

C 用动词模板 $hit \square (\square) a \square (\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square)$ (经常是反身的或相互的):

- 诙谐俚语 *hit randevú* (INTR) “(他们)有聚会”,保留了其国际来源的辅音串 *rendez-vous* (参见 Sappan, 1971:77a)。

D 使用动词模板 $(\square)(\square) \square i (\square)(\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square)$ (传统为 $\square i \square \acute{e} \square$):

- *le-katér* (INTR) “哀鸣,抱怨”,可追溯到波兰依地语 *kútIr* “公猫、抱怨者”,(参照立陶宛依地语 *kótIr*) 可能是因为当猫要吃的/热了/交配时会发出呜咽的声音。
- *le-faksés* (TR) “(用传真机)传送”,可追溯到国际化的 *fax*。

E 使用动词模板 $(\square)(\square) \square i (\square)(\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square)$ 的 $(\square) \square o \square \acute{e} \square$ 变体:

- *le-yonén* (TR) “离子化”,可以追溯到国际化的 *ion*。
- *le-kodéd* (TR) “编撰、整理”,源自以色列语 *kod* “编码”,可追溯到国际化的 *code*。

虽然 $(\square)(\square) \square i (\square)(\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square)$ 是能产的,但 $\square a \square \acute{a} \square$ 不是。原因就是音系学家说的“韵律结构”。 $(\square)(\square) \square i (\square)(\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square)$ 的韵律结构(我称其为 $\sigma_i \sigma_e$, σ 表示音节)在所有的时态中都保留了辅音串。例如 *le-transfér* “转移(人们)” (TR), 过去时(3msg)说 *trinsfér*, 现在时是 *metransfér* 将来时是 *yetransfér*。辅音串 *transfer* 一直保留。

一个关键提示是选择的动词模板的能产性。希伯来语能产性最强的动词模板是 $\text{a}\text{á}$ ，与此不同，以色列语最能产的动词模板是 $\text{i}\text{é}$ ($\sigma_i\sigma_e$)。这种能产性在被认为不是外来词的名转化(参见 Bolozky, 1978, 即动词化)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结论:闪米特语的辅音词根的重要性被连根去除了。与 Bat-El (1994, 2003)一样,我认为这样的动词是基于词条而不是所谓的以色列语中自然化的词根。

2.4 起始体

依地语对以色列语动词系统的语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标志动作开始的起始体动词。以色列语的 *shakháv* “was lying” down (3msg)(躺下)^①是中性的,而以色列语的 *nishkáv* “lay down, started being lain down” (3msg)却是起始体。重要的是,以色列语中一些起始体的形式是新的,并不是原来存在于希伯来语中的。(见 Blanc 1965:193—7)选来承载这些形式的动词模板是带前缀的: $\text{ni}\text{á}$ 和 $\text{hit}\text{a}\text{é}$ 。表1包含了以色列语中新的起始体动词和它们的依地语的形式,还有更古老的中性形式。(以色列语动词的翻译是现在时,虽然给出的基本形式是 3msgpast)

依地语的影响还表现在分析性的中性(非起始体)动词的存在,这些动词是由于类推的作用从起始形式发展来的。还应注意依地语的作用经常导致对已存在的希伯来语起始形式使用的增加。与重合原则和多来源一致,进一步的研究应检验依地语起始体的影响是不是被扩大了,或者是伴随俄语和波兰语中并存的平行的起始形式一起的,因为一些第一代说以色列语的人也说这两种语言(参照 § 2.12)。

表1 依地语和以色列语中的起始动词

中性的 (延续体)(无标记的)		起始体 (标示一个行为的开始)(有标记的)		
以色列语 - 大多是旧形式 -	依地语	以色列语 - 大多是新形式 -		依地语
$\text{a}\text{á}$ 动词模板		$\text{ni}\text{á}$ 动词模板	$\text{hit}\text{a}\text{é}$ 动词模板	
שכב <i>shakháv</i> “be lying down”(躺)	ליגן <i>lign</i>	נשכב <i>nishkáv</i> “lie down”		אָוֶעק ליגן זיך (<i>avék</i>) <i>leygn zikh</i>
ישב <i>yasháv</i> “be sitting”(坐)	זיטן <i>zitsn</i>		התישב <i>hityashév</i> “sit down”	אָוֶעק זעטן זיך (<i>avék</i>) <i>zetsn zikh</i>
היה מלא <i>hayá malé</i> “be full”(满了)			התמלא <i>hitmalé</i> (<i>hitmalá</i>) “get full”	

2.5 前附词 be-“在”、le-“到”、mi-/me-“从”、ve-“和”正在进行中的非附化进程

与 SAE 一致,以色列语前附词 be-“在”、le-“到”、mi-/me-“从”和并列连词 ve-“和”音系上的依赖程度比希伯来语的弱。

① 保留英语解释是为了要保留原文要表达的时、体的差别,只给出主要动词的基本意思,下文还有类似情况都是如此处理的,就不一一赘述了。

虽然从拼写上, *be-*“在”、*le-*“到”、*mi-/me-*“从”和 *ve-*“和”和后面的寄主形成一个词, 但有一些迹象表明非附着化正在发生中:

- (i) 希伯来语中前附语的范围限于一个寄主: 可以说 *be-'atúna, be-zhenéva u-ve-lóndon* (<*ve-be-lóndon*), 逐字译过来是“在雅典、在日内瓦和在伦敦”。而以色列语和英语一样, 要说 *be-atúna, zhenéva ve-lóndon*, 直译为“在雅典、日内瓦和伦敦”。
- (ii) 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些介词后停顿, 加入一个他/她在说出这个介词前没有想到的寄主。例如, 可以说 *ze hayá be, be-mélbörn, lo, sídni* “它是在, 在墨尔本, 不, 悉尼”。
- (iii) 与希伯来语不同, 后接的 [b]、[k] 和 [p] 没有擦音化为 [v]、[ç] 和 [f]。例如, 以色列语的“在二年级”是 *be-kitá bet* 而不是 *be-khitá bet*。
- (iv) 与希伯来语不同, 以色列语前附语不根据寄主的第一个音节改变其元音。例如, 以色列语说 *be-shvédya* “在瑞典”而不说 *bi-shvédya*。

虽然形式是希伯来语介词, 但结构重组后复制的是欧洲的/依地语的模式。这种附着语的弱化可能导致完全的非附着化。

2.6 数和名词的(不)一致

希伯来语名词和数词之间一直有一种性别级化一致。看这对例子‘*éser banót* “十个女孩”对‘*asar-á baním* “十个 fsg 男孩”。后者中标示女性的后缀-a 加到了修饰男性名词的数词后。然而, 在大多数以色列的个体语言、社会语言和方言中, 名数对应系统要简单得多: ‘*éser banót* “十个女孩”和 *éser baním* “十个男孩”。与依地语一样, 修饰男性名词和修饰女性名词的数词之间没有区别。

事实上, 巨大的语言规范压力(Zuckermann, 2008b)已经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混合形式。官方规则的使用经常是不一致的, 因为这些规则与众多的个体的、社会的和方言的现实相比, 是反语法的, 这是令人迷惑的。

因此, 以色列语已经显示了双重语体的迹象: 生来就说的以色列语口语对非母语性的书面语中使用的(高层的、假的)希伯来语。如果语言计划继续下去, 就是说如果以色列老师继续教以色列人使用希伯来语语法而不是以色列语语法, 完全的双重语体就有可能确立。

2.7 时态系统

《圣经》希伯来语没有时态, 只有完成体/非完成体的区别, 以色列语与此相反, 有三种时态: 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这与依地语和《密西拿》希伯来语相似。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与 § 2.8(见下文)提出的相似。我要提出的是以色列语的时态系统是多来源的。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时和将来时中, 动词形式因性别、数和人称而变化。然而, 现在时中动词形式只根据性别和数发生变化, 没有人称的区别。原因是现在以色列语的形式可追溯到希伯来语分词, 而希伯来语分词比历史上的完成形和非完成形要简单得多。

2.8 成分顺序

以色列语言学家经常声称以色列语的语序, AVO(E)/SV(E), 证明了《密西拿》希伯来语的影响, 后者的有标记语序(为了强调/对比)正是 AVO(E)/SV(E), 这与《圣经》希伯来语的 VAO(E)/VS(E)的语序相反。然而, 《密西拿》希伯来语和 SAE 句法有相似之处。包括下面

的观点,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或解释。

- (i) 单来源:以色列语的句法是希伯来语的,与 SAE 相似是偶然的。毕竟,可能的选择是有限的。
- (ii) 单来源:以色列语的句法是 SAE 的,偶然与过去的《密西拿》希伯来语(或更近期的某种文学希伯来语的变体)相似。
- (iii) 多来源:以色列语的句法是同时基于 SAE 和希伯来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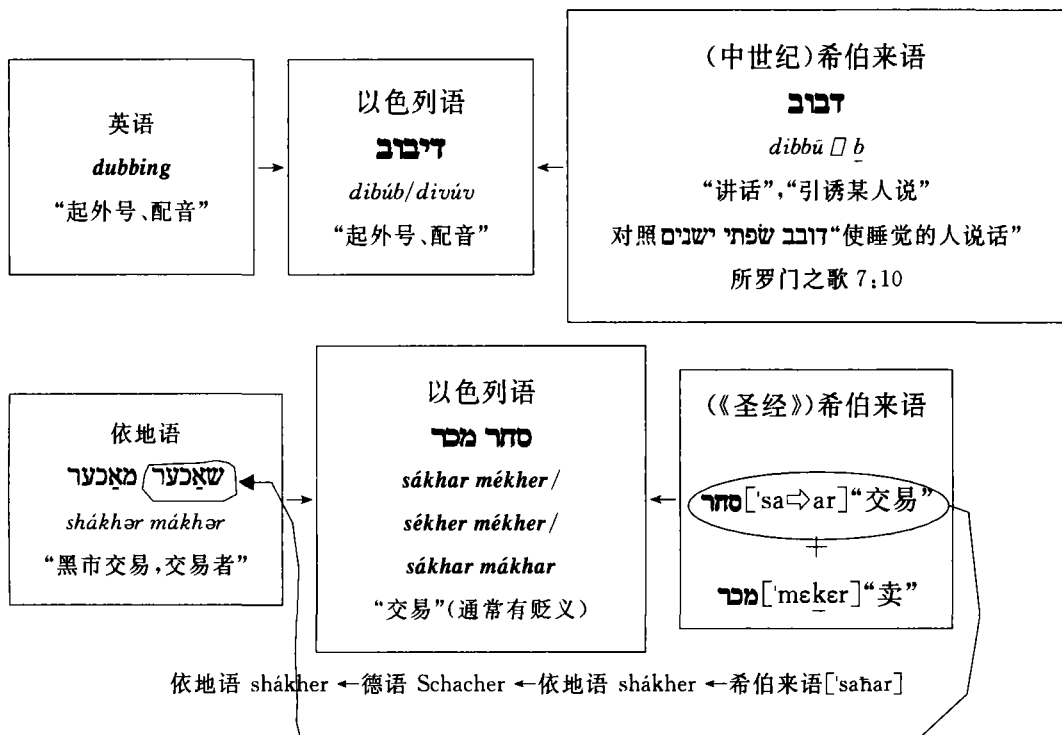
虽然规范主义者选择分析(i),修正主义者选择分析(ii),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相信单来源。我的混合说以多来源为理论核心,倡导分析(iii)。

2.9 系动词加强

与存在很多无动词句的希伯来语不同,以色列语经常使用系动词,即近指指示代词 *ze* 和代词 *hu* “他”、*he* “她”、*hem* “他们”和 *hen* “她们”,所有的形式都可以追溯到希伯来语。虽然希伯来语本来就有系动词,但它的使用被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强化了。依地语总是要给无动词句加系动词 *dos méydʃ iz klug* “这个女孩儿聪明”。同样地,虽然类型是欧洲语言的,但形式还是希伯来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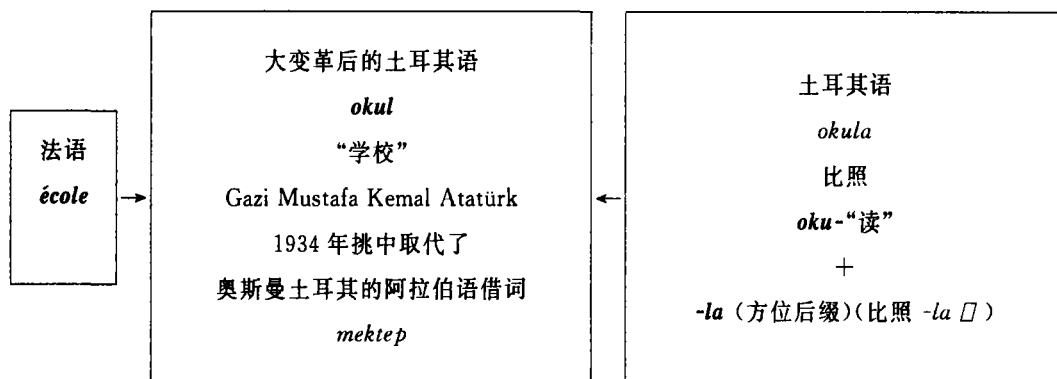
2.10 语音-语义对应

以色列语有超过两百对“语音-语义对应”(PSM, Zuckermann, 2003),其中的词条是同时从两个或多个语音上和语义上相似的来源派生来的。我把 PSM 定义为伪装的借词,一个语音和语义上相似的外语词与已经存在的本族词对应。例如下图所示:



通常在 PSM 中,来源语不仅决定词根的选择,也决定名词模式的选择,因而形成了对目标语形态的伪装的影响。

与本文讨论的几乎所有其他特征相反,这样的“词汇调整”(参照 Dimmendaal, 2001: 363)时常被语言规划者们编造成伪装借用的一种方式。看下面的例子:



(见 Zuckermann, 2003: 160—161)

2.11 语言性别和名词模板的能产性

英语词进入美国意大利语或英国意大利语所作的形态调整通常都带有意大利语中语义上相似词的语言性别,以色列语有无数可能的名词模板,显示了相同的现象(还需要确定的是这样的性别调整模式的规律性)。以色列语 *mivréshet*“刷子”和 *mis'éret*“(原来的)刷子,(后来的)带长毛的软刷”,都是阴性的。我认为阴性的名词模板 $mi \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et$ 的性别选择是由“刷子”后面跟的词的女性决定的。下面(表 2)给出了“刷子”在以色列语和其他贡献语中的情况。

表 2

以色列语	阿拉伯语	英语	依地语	俄语	波兰语	德语	法语
<i>mivréshet</i>	<i>mábrasha</i>	<i>brush</i>	<i>barsht</i>	<i>shchē □ tka</i> (f)	<i>szczotka</i>	<i>Bürste</i>	<i>brosse</i>

注意虽然 $mi \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et$ 确实用于工具,还有其他合适的名词模板,对照 *mavrésh* 和 **mivrásh*,都是阳性的。有人可能会说选择 $mi \square \square \acute{e} \square et$ (造成 *mivréshet*) 是为了顺应依地语 *barsht* 的 [t]。这不能减弱性别起关键作用的假设,本·叶胡达最初创造的以色列语形式是 *mivrashá*, 适合名词模板 $mi \square \square a \square á$, 后者缺少 [t] 但还是阴性的。在本族语人耳中更雅的以色列语 *mivréshet*, 是后来出现的。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系统地探索所有的以色列语新造词的性别与它们的欧洲和闪米特贡献语相应部分的关系。Zuckermann (2003) 就几百个语音-语义对应词已经作了这样的研究。

2.12 仿造

考虑下面的例子:

以色列语 *מה נשמע má nishmà*, 直译为“听到什么?”, (虽然一些以以色列语为母语的人把它理解为同音的“我们会听到什么?”) 即“你好吗?”

(1) 依地语 *וואס הערט זיך vos hert zikh* [通常读成 *v(o)sértsəkh*], 直译为“听到什么?”, 即“你好吗?”

(2) 俄语 Что слышно *chto sl [] [] shno* 同上。

(3) 波兰语 *Co słychać* 同上。

请注意虽然大多数复苏主义者原来都是讲依地语的,但一些最早说以色列语的人也说俄语和波兰语。所以20世纪30年代一个说波兰语的人使用 *má nishmà* 可能不(仅仅)是由于依地语的 *vos hert zikh*,而是由于波兰语的 *Co słychać* 等。这是重合原则的一个表现。

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语 *perestroika* 是带国际性的俄语来源的借词。然而,很少以色列人知道常用的以色列问候语 *má nishmà*? 实际上是一个仿造的词。从共时的角度看,这个短语的形式是100%希伯来语的,这么说并没有出卖非希伯来语的共同来源(依地语、波兰语和俄语),它们提供了模式。因此,如此多的人忽略欧洲语言对以色列语的影响就不奇怪了。

2.13 合并紧缩

以色列语构词中有很多如紧缩式这样的欧洲语言的机制。与 *kómpaktdisk* “激光唱片”一样,以色列语有紧缩词 *taklító*,由希伯来语来源的 *taklít* “录音”和 *or* “光”构成。与希伯来语不同,以色列语中有很多合并紧缩词,如 *arpiakh* “烟雾”由 *arafél* “雾”和 *piakh* “黑灰”构成, *midrakhov* “(步行)商业街”由 *midrakhá* “人行道”和 *rekhóv* “街道”组成。而且,以色列语中还有词根紧缩的情况,如 *dakhpór* “用推土机铲平”,混合了 *d. h. p.* “推”和 *h. p. r.* “挖”——参照 *shiltút* “沿通道快速移动”,是由 *shalát* “(遥远地)控制”和 *shitút* “游荡”派生来的。

三 总结

本文是为了使下面观点得到认可: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如果没有来自复苏主义者的母语的多重营养是不可能复苏的,以色列语应被看成是一种混合语。以色列语中,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在所有的语言成分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影响通常是模式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而且,以色列语表现出了形态和音系的分裂。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形态形式是希伯来语的,如不连贯的变形动词,但以色列语的语音和音系系统,包括这些希伯来语形式的发音,却是欧洲语言的(参见 Zuckermann, 2005)。

未来的研究可以逐一检测以色列语每个语言特征和希伯来语、依地语和所有其他贡献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新出现语言的语言接触太复杂,不能归入如“希伯来语的复活”、“希伯来语对依地语的再词汇化”或普遍简化这样的模式。

我假设重合原则对以色列语的研究有最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特征在不止一个贡献语中存在,那它就更有可能在新出现的语言中保留下来。这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而且也适用于普遍的语言演化。它对新语言即语言发生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此,从以色列语可以得到关于普遍语言的若干结论,理由如下:(i)语言工程的影响和取向与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有相似之处;(ii)以色列语中欧洲语言的作用不是刻意的,即以以色列语的很多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鉴于混合语被一些人定义为“不正常的”)。以色列语的情况说明语言发生现实要比简单的谱系树系统允许的复杂得多。“复活”的语言不可能是单来源的。

希伯来语复活主义者设法否认他们的欧洲的根、否认大流散和避免混合语的企图失败了。(事实上,混合语的特征也反映在依地语本身上,这也是大多数复活主义者所鄙视的)因此,以色列语的研究为普遍的语言和文化的动态关系,特别是语言作为集体自我感知源泉的作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启发。我坚持认为以色列语是一种欧亚(欧洲-闪米特)混合语。无论我们选择怎么称呼它,我们都应该承认它的复杂性。当人类使一种语言复活时,就应作好准备最后出现的会是混合语。

参考文献

- Bat-EL, O. 1994 Stem modification and cluster transfer in modern Hebrew.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2. 571-96.
- 2003 Semitic verb structure within a universal perspective. In J. Shimron (ed.)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Acquisition in Languages of Semitic, Root-Based, Morphol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9-59.
- Berman, R. A. 1997 Modern Hebrew. In R. Hetzron (ed.) *The Semit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312-33.
- Chomsky, W. 1957 *Hebrew - the Eternal Language*.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 Dimmendaal, G. J. 2001 Areal diffusion versus genetic inheritanc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8-92.
- Glinert, E. (L.) 1991 lemekór haivrit hakhdashá hamedubéret; iyunim batakhbir hasamúy shel 'lefi hatáf' ledavid yélin (On the source of spoken modern Hebrew; studies of the covert syntax in *Lefi Hatáf* by David Yellin). *Leshonenu* 55. 107-26.
- Haramati, Sh. 1992 *ivrit khayá bimrutsát hadorót (Living Hebrew throughout the Generations)*. Israel: Masada.
- 2000 *ivrit safá medubéret (Hebrew - a Spoken Language)*. Israel: Ministry of Defence.
- Harrison, G. A., Tanner, J. M., Pillbeam, D. R. & Baker, P. T. 1988 *Human B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volution, Variation, Growth, and Adap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vath, J. & Wexler, P. 1997 Editors of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and Non-Creole Languages -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itian Creole, Modern Hebrew, Romani, and Rumanian*. Wiesbaden: Harrasowitz.
- Kerswill, P. 2002 Koineiz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J. K.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669-702.
- Mufwene, S. S. 2001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chardt, H. 1884 *Slavo-deutsches und Slavo-italienisches*. Graz: Leuschner and Lubensky.
- Shur, Sh. A. 2000 *gdud meginéy hasafá beérets israél 1923-1936 (The Language Defendants Regiment in Eretz Yisrael 1923-36)*. Haifa: Herz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Study of Zionism.
- Singler, J. V. 1995 The demographics of Creole genesis in the Caribbean; a comparison of Martinique and Haiti. In J. Arends (ed.) *The Early Stages of Creo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3—32.

- Ullendorff, E. 1997 Review of N. Sh. Doniach & A. Kahane 1996. Editors of The Oxford English-Hebrew Dictiona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 55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msatt, W. C. 1999a Genes, memes and cultural heredity. *Biology and Philosophy* 14, 279—310.
- 1999b Generativity, entrenchment, evolution, and innateness. In V. Hardcastle (ed.) *Biology Meets Psychology: Constraints, Connections, Conjectur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39—79.
- Zuckermann, G. 1999 Review of N. Sh. Doniach & A. Kahane 1998. Editors of The Oxford English-Hebrew Diction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2, 325—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Enrichment in Israeli Hebr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2004 Cultural hybridity: multisourced neologization in “reinvented” languages and in languages with “phono-logographic” script. *Languages in Contrast* 4, 281—318.
- 2005 “Abba, why was Professor Higgins trying to teach Eliza to speak like our cleaning lady?”: Mizrahim, Ashkenazim, prescriptivism and the real sounds of the Israeli language. *Australi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19, 210—31.
- 2006a Complement clause types in Israeli. In 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Complementation: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Vol.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2—92 (Chapter 3).
- 2006b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straight-talking Israeli.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 53, 4, 467—81.
- 2008a *Israelit safá yafá (Israeli, a Beautiful Language)*. Tel Aviv: Am Oved.
- 2008b “Realistic prescriptivism”: the academ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its campaign of “good grammar” and *lexpionage*, and the native Israeli speakers. *Israe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1.

(王晓梅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300387; 曾晓渝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Nankai Linguistics

Volume 12

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in This Issue

Wang, William S. -Y. Evolution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dopt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which human language emerged as a mosaic, integrating and building upon many sensory, motoric, computational, and memorial endowments that are especially well developed in our species.

I report briefly on two research directions currently pursued in our group in Hong Kong. In one direction, we simulate language emergence by multi-agent interaction; we find that the lexicon co-evolves with morphosyntax, and that sentential order results from generalized phrasal ord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we study how language processing is reflected electrically in brain waves. We discover that linguistic anomalies are detected very early in the ERPs, and that lexical tones are perceived categorically even when our attention is occupied elsewhe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language should be studied in a broad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lending the synchronic with the diachronic,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communal, the biological with the social, the theoretic with the applied. Results from these many areas will eventually converge to the “consilience” in the sense recently defined by E. O. Wilson.

Key words: 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direction; multi-disciplinary

Wu, Anqi. An Explanation on *YueRenGe*

According to the middle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of mid-old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YueRenGe* are reconstructed. Basing on old Dong-Tai language, *YueRenGe* is regarded as a love song for sweetheart of old Yue people.

Key words: *YueRenGe*; phonology of old Chinese; old Dong-Tai language; love song

Zuckermann, Ghil'ad. Hybridity versus Revivability: the Genesis of the Israeli Language — Multiple Causation, Forms and Patterns. Translated by Wang, Xiaomei; revised by Zeng, Xiaoyu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suggest that due to the ubiquitous multiple causation, the revival of a no-longer spoken language is unlikely without cross-fertilization from the revivalists' mother tongue(s). Thus, one should expect revival efforts to result in a language with

a hybridic genetic and typological character. Multiple caus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gruence Principle. Whereas most forms of Israeli are Semitic, many of its patterns are European. The multi-sourced nature of Israeli and the role of the Congruence Principle in its genesis have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anguage planning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Key words: hybridity; revivability; Israeli language; Hebrew

Li, Ji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nai* (乃) from Ancient Times to Mediaeval Tim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ond-person-pronoun “乃” from ancient times to mediaeval times, to discuss “乃 X”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in ancient times, but not the element of the second-person-pronoun used as attribution after Han Dynasty, for its decreasing in number, limitation in style and using literary quotation. It also made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refined-words and words having trend of being refined, which expressed the first person or third person appellation as a whole. The new feature of “乃 X” also makes out the error in dictionaries, which takes “乃” for the third-person-pronoun in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using literary quotation; trend of being refined; refined-word

Gu, Feng. A Sketching of Grammaticalization: Preconditions, Motivations, Mechanisms and Recent Approaches

Preconditions,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are three main cornerstones of the system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mmonly,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is induced by pragmatic inference, the emergence of a grammatical form is based on the frequency use of that form, as well as the generalization of its meaning. In addition, reanalysis and analogy can be regarded as two main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 In recent years, this issue has attracted many grammarians' attention, they have broadened the scope of grammaticalization study, which caused us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precondi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recent approach

Deng, Dan; Shi, Feng. Pitch Analysis of Disyllabic Prosodic Word in Putonghua

The pitch performance of disyllabic prosodic word of Putonghua in real stream were studied in the present paper, which mainly review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sition in prosodic phrase, break level and neighbor ton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itch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prosodic position and neighbor tone. The prosodic position affected the height of tone, from the initial of prosodic phrase to the final, the pitches all declined. Neighbor tone affected the head-tone or tail-tone. There was prosodic peak in contour of prosodic word of